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五周年，中國在過去經歷了怎樣的翻天覆地變化？常言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本刊將於12月號刊出一個專輯，邀請學者從多角度回顧改革歷程，前瞻變革走向。

——編者

朝鮮戰爭研究的經典力作

沈志華教授在〈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決策的分析和反思〉（《二十一世紀》2023年8月號）一文中主要討論了三個問題，即朝鮮戰爭的爆發原因和中國的角色、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過程及原因、中國在停戰談判中的考量及後果。

對於沈志華「中國被蘇朝綁架而捲入戰爭」的觀點，美國和韓國不少學者都投以質疑的眼光。他們認為這只不過是為當年中國的決定脫罪的說辭而已。但是，冷戰結束之後陸續公開的蘇聯檔案和朝鮮高層官員的證言，已經比較完整地展現當時蘇朝之間的密集交流以及中國的處境。金日成三番兩次請求訪問莫斯科，而在斯大林的戰略棋盤中，將朝鮮元山當作旅順港的替代品之後，

中國作為東方革命的負責人，不得不揹起了參戰這一塊燙手山芋。

中國決定出兵的過程一波三折，除了根據戰事的準備和推進情況以及與蘇方的討價還價外，還包括中國領導層短暫的意見分歧。沈志華在文章中將1950年7月到10月的中國決策過程梳理得一目了然，邏輯清晰，言簡意賅。

其實早在1949年，原屬於東北野戰軍的三個朝鮮師便回到朝鮮並編入人民軍。金日成獲得這批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驍勇之師之後，三個月內掃平三千里江山南半部的信心大增。事實也證明，1950年6月開戰第三天即攻克漢城的三個團，就是來自於這一批部隊。或許西方社會憑藉這個事實，而咬定中方介入戰爭早有預謀和實際行動。但是，這種觀點卻忽略了朝鮮人自身的意願這一最重要的因素。在朝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已經融入到中共血液裏的朝鮮左派力量，一直以來堅信中國革命結束之後就要輪到朝鮮革命，因此後來的朝鮮戰事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主要推動因素還是朝鮮民族的內部矛盾。

中國介入戰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新生政權，將戰火拒諸國門之外。只不過新中國領導層更加看重軍事對抗的結果，而忽略了外交談判的效果。更為確切的是，對於紛繁複雜的國際社會遊戲規則不夠了解和疏於掌握。或許，中國對同美國的較量也做過詳細的準備，但是可惜未能把握住軍事勝利所帶來的轉瞬即逝的外交機遇。這也是戰爭後期中國不得不付出更多代價的原因，更是為長期游離於聯合國等主流國際社會組織埋下伏筆。

趙青峰 常州

2023.8.30

中國為和平而戰？

朝鮮戰爭停戰七十餘年來，有關朝鮮戰爭的研究汗牛充棟。新的史料、解析總會為解讀朝鮮戰爭提供多元化的視角和契機，尤其以沈志華為首的學者，在為史學界解讀朝鮮戰爭提供了詳實、可靠的史料依據的同時，既拓寬了朝鮮戰爭研究的邊界，也進一步加深了研究的深度。

金東吉的〈「出而不戰」：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重探〉（《二十一世紀》2023年8月號）一文利用中俄兩國文獻、檔案以及訪談資料，重新考查了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因和動機。作者詳細地梳理並揭示出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1950年7至10月間，就中國是否出兵朝鮮這一問題上的複雜而又艱難的抉擇歷程。文章批判了迄

今為止史學界研究中以冷戰思維模式和意識形態對立為中心框架對朝鮮戰爭進行解構的現象。作者試圖擺脫這種傳統主義的窠臼，具體地考察了朝鮮戰爭與中國國內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的聯動性、相關性，並着重分析戰爭給中國帶來的諸多方面的影響。

作者在文中的觀點主要有兩方面：其一，美軍越過「三八線」，並不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前提；其二，中國決定出兵朝鮮的關鍵原因在於，如果中國出兵朝鮮，美韓軍隊可能就地停止前進，中國可以在不與美國打仗的情況下，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朝鮮北部。中國出兵朝鮮是出於實際利益的考慮，即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益。這一見解非常新穎獨特，為學界提供了一個極具討論意義的視角。但是，作者的觀點能在多大程度上與史實相契合，仍需學界的後續探討與實證。

戰爭爆發初期，中國秉持着追求東北亞乃至世界和平的原則試圖去解決這一問題。但是，呼籲和平的抗美援朝運動為甚麼最終會演變成走向戰場、發生正面衝突，並舉全國之力進行殊死對抗的抗美援朝戰爭？筆者認為探討造成這種轉換的原因、發生這種轉換的過程及其意義，是理解中國為何決定出兵朝鮮的關鍵因素。文章很好地梳理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可惜沒有提及美國對當時的戰略誤判，以及中共領導層對於這一誤判的因應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在當下的中美關係中，朝鮮戰爭中

美國的誤判仍然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問題。

張超 首爾

2023.8.15

對外戰爭與國內政治的互動

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決策是冷戰史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陳兼教授此前有過不少專門的論述。最近，他在〈中國入朝參戰若干問題的再探討〉（《二十一世紀》2023年8月號）一文中，利用蘇聯解密檔案以及中國的公開文獻等史料，重新對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對戰爭的應對及準備、參戰決策的曲折過程、戰爭目標的修正及相應的戰略轉變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值得注意的是，陳兼認為，參戰經歷及其相關敘事對中國產生了長遠的影響。事實上，陳兼論述的決策過程以及參戰所造成的複雜影響，體現出一個明顯的特徵，即對外戰爭與國內政治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是朝鮮戰爭與中國國內政治動員之間的互動。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之際，為了動員民眾支持朝鮮與美國作戰，中共在國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在這一高舉愛國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旗幟的強力動員之下，中共順勢推動了「鎮反」、「土改」、「三反」、「五反」等改造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運動，全面強化了對國家、社會的控制。抗美援朝運動的初衷是為戰爭而展開社會動員，卻在客觀上助了中共推動社會改造運動一臂之力。正如劉少奇所指出，如果沒有

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很多事情不好辦」。

其二是朝鮮戰爭與中共政治、經濟體制之間的互動。通過回顧中國參戰決策過程這一經典案例，我們可以從側面認識到建國初期中共的決策體制，以及毛澤東個人在其中的地位。由於入朝與美國直接作戰後果嚴重，直到1950年10月4日在彭德懷回京支持之下，毛澤東和周恩來才說服中共其他領導人改變立場支持出兵。可見，按當時中共的決策體制，如果大多數領導高層反對，毛難以做到乾綱獨斷。然而，在朝鮮戰爭停戰之後，憑藉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毛的個人威望大增，擁有了更加不受限制的權力。此外，朝鮮戰爭造成中國的外部安全局勢緊張，國防工業和重工業成為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在對外關係上，中國在朝鮮戰爭之後更加倚賴蘇聯，接受蘇聯大規模援助的同時，採納其高度集中且具有統制性的計劃經濟模式。可以說，朝鮮戰爭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歷史上，對外戰爭與國內政治互動的案例並不鮮見，但是在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之下，朝鮮戰爭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對此，陳兼認為抗美援朝的歷史敘事為毛澤東想像的「繼續革命」道路、持續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提供了動力。遺憾的是，本文並沒有為這一重要的觀點進行足夠的敘述和論證。這一歷史敘事如何增進毛的個人權威？如何與各時期的社會動員相結合？還需要後來者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謝定元 上海

2023.9.3